

学术批判参考资料

(尚钺文章选录)

内部材料 用畢收回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印

1960年4月

目 錄

“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序言·····	1
与刘大年同志談談学术批評·····	7
踏实鑽研与坚持真理·····	64

“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序言

“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原名“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性質之探討”)这个集子收集了我室一九五五年毕业研究生韓大成、王方中、黃佩瑾和李之勤四位同志关于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以至清初(实际上是到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国社会經濟变化与发展之研究的四篇論文。这四篇論文，是从不同的角度，如韓大成同志从明代中国資本主义关系之萌芽及其增長方面，王方中同志从明代賦役制度的变化方面，黃佩瑾同志从城市經濟发展方面，李之勤同志从一八四〇年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經濟发展方面，根据所能搜輯到的史料，結合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这些問題的指示，对于中国資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及其增長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質进行初步探討。我們的意图很簡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經濟的发展，在一八四〇年以前，早已孕育着資本主义萌芽，就是沒有外国資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也能緩慢地发展到資本主义社会。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指示：中国人民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鴉片战争实行反对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斗争。但是作为资产階級性革命的物質基础的，首先是发展中的資本主义經濟因素反对腐朽封建制度的阻碍——这一經濟解放的要求，是毫无問題的。因此不闡明一八四〇年以前，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資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及其到一八四〇年以前所达到的水平，就不可能了解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战争中，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之

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和民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

为着解决这些困难的和复杂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一些同志们——近年来都在摸索这一问题。从我们的摸索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完全正确。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就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这种萌芽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仅影响到农业商品性的发展，改变了农业经营，而且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与形式上，在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的斗争上，也反映到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制度的赋役上。并且，这种变化，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还比较明显地看出是从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間（一五〇六——一五六六），即十六世纪前期开始的。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来的，所以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商品经济有了某些发展，在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如苏、松、杭的三角地区等城市手工业中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自此以后，这些新的经济的萌芽，一直在成长着。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渐渐发展成比较有力的社会势力。因之，就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因为它还未发展成决定的社会势力，所以它还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

在这一本集子所收的四篇论文中，除李之勤同志的一篇文章，专门阐述清代前期（十七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前期）的商业性农业发展的状况外，其余三篇系就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三个不同的方面的状况着手来研究的。这些同志都是进行了相当长期的研究，他们都对于自己所处理的专题搜集了一定的史料，并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最后才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结论的。

本来，按原来计划，这个集子与我所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的三篇文章，合成一个集子，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及变化总的趋势，加以比较全面的考察。但是因为这样的合集，就显得分量太重，同时也因为这四篇文章完成时间较迟（初稿都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完成的），所以就分成了两个集子。我的集子交三联书店出版，这个集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如此，但是这两个集子，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姊妹集子。而且有很多地方，在这本集子中，对于我们原来的提法，根据史料和理论都进一步作了研究和补充。就在这个集子中，虽然韩、王、黄三个同志，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自己的专题研究的，但是由于有些参考资料是共同的，还由于搜集史料的范围不够广，因而有若干材料是相同的。不过，由于材料是用于不同的问题和方面，所以对材料的分析和运用上，就又显出不同来，而且在引用中多寡也不完全一致，虽然，在总的方面及其所企图解决的问题，仍然多少是相同的。

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问题。因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断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譬如，以太平天国这一个近代史上伟大农民革命战争来说，就其

性質說，已經屬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範疇，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如天朝田畝制度，平等和平均觀念的發揮，以及政治和軍事組織及其內容，如果不與明清之際的市民鬥爭及其參加農民鬥爭的現象聯繫起來，特別是不把它作為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與政策的一個發展來看，就無法解決。同時，如果不把太平天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理想，作為從明末清初經濟思想上的均田、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政治、和社會思想上的平等平均的觀念（由地主與農民平等，男女平等，追求個性解放，反對儒釋道封建宗教的束縛）等等反封建特權及反封建大產鬥爭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的繼續和發展、並將它在人民大眾的革命綱領和實踐行動中具體化，也是無法理解的。

我們不否認中國社會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最後必然要歸結到普遍性、即歸結到人類社會一般發展的法則，這是由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所規定了的。許多史學家把太平天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歸結為是隨着外國資本主義侵入而來的基督教的原始教義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不僅是因為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生作用；而且因為這樣的論斷是僅就上帝會的形式來觀察的。實質上太平天國革命所提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與產生於明清之際一直到太平天國時始終不停、繼續發展着的社會矛盾之上的新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乃至社會問題，如市民運動，特別是其中的資產者與無產者的鬥爭，在蘇州開始以階級的集團的形式出現^①，以及民主的和民族的思想的發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這才是西方的原始基督教義能夠在中國廣大人民羣眾中發生作用的物質基礎。

① 見拙著“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附錄”。

正因为如此，关于明清之际社会性質問題的探討，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也許有同志看見我們提出“社会性質”的問題来，会誤認為我們主張明代中国社会已是資本主义社会。不是的，我們肯定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內部，也有它发展不同的阶段。我們所以这样提，不过是認為明清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經是在开始变化的封建社会，而社会的变化，从量变到質变还有很長一个过程，就是說，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經是在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不再是什么自然經濟整体的“完整的封建社会”，或“原封未动的封建社会”。就是說，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經逐漸变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制度已經愈益成为要被推翻的东西了。它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却是衰竭的、死亡着的东西。这样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早期（魏晉南北朝时代）和中期（如唐宋时代）那种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性質的时代，在明清之际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清初統治階級虽然在殘酷的空前大破坏之后，繼之企图以軍事政治权力把中国社会倒拖回去，而終于在与經濟发展的冲突中，到乾隆中叶便走向下坡，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危机。这就是在一八四〇年随着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引起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到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展开的反封建的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变的关键。总之，明清之际的封建社会的性質在起着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是必須經過由量变到質变的長期的緩慢的过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显然还未达到質变的程度，所以仍然是封建社会。

最后，对于这样的大問題，由于我們的业务水平和理論水平的限制，因之，处理問題和史料的不够正确，甚至錯誤的地方，一定难免。不过，为着向史学界提出我們对明清之际中国

社会性质的很不成熟的想法，及很有限的史料与说明，一则作为抛砖引玉的引子，再则，我们也可以由此而获得各方面专家的指教，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很不成熟的文章汇集成这个集子出版了。

（“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1957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第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

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本集共分两卷，上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下卷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

与刘大年同志談談学术批評

一 前 言

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我国历史科学也获得超迈前代多少世紀以来的大发展，这就可能使多年来存在的历史問題，增加了解决的可能性和新史料。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一方面扩大了考古学工作的队伍深入田野，打开了地下博物館，提供出大量新的直接史料，为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原野。另方面关于作为社会真实基础的經濟情况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特别是許多史学工作者，对于明清兩代资本主义萌芽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使我国历史由低級向高級发展的綫索，获得初步肯定的認識。这些成績，就使我国的历史科学面貌为之一新。因此，毛泽东同志期望我們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場和方法来研究我国的历史，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做出正确結論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毛泽东同志对我們的指示，尤其重要的，就是对中国历史問題上，过去未加研究及“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我們必須郑重地加以研究和解决。但我們的理論和业务水平都不高，旧社会資产階級史学的影响又很重，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所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修正主义、表面性和片面性等毛病，有时就不可避免地于不覺間会在工作中冒出来。因此，这一阶段，我們虽获得很大的成績，但却走上了另一偏向——厚古薄今。这，不仅能阻碍我們对新鮮事物的認

識，也阻碍了自己在工作和学习上的进步，因之就不能完成一部比較科学的人民历史。这些毛病，在今日工人階級和农民階級及广大人民群众“反保守”、“大跃进”的时代，就特別值得我們警惕。

正是因为我們都或多或少有着这种和那种缺点和毛病，为着建立社会主义和历史科学，就必须坚持自己思想改造。因之，在学术上展开批評与自我批評就成为迫切需要的了。这，不仅是促进我們个人前进，而且是推动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动力。为着达到这一目的，我們的学术批評就不是别的，而是如馬克思所說的：“……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識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結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說，能作为这种批判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現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別的事实来比較对照。在这种批判上，唯一重要的，是兩種事实必須尽可能同受正确的研究；是这两种事实，必須现实地，在互相对待的意义上，成为不同的发展要素。但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地研究各种秩序的序列，各个发展阶段依以出現的次序与联結。”^①很明显，批評的出发点，不是观念，而是批評者拿自己所掌握的事实与被批評者所掌握的事实，在同样正确地肅正客观研究的基础上，从比較对照中提出不同的看法，来研究一个特定的具体事物或問題，更不是以我的或我所知道的概念，来衡量你的事实。这样的方法是根本无法进行批評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出完全吻合另一个人意願的事物来，尤其是吻合于另一个人主观願望的事物。

其次，我們的批評，并不是为批評而批評，而是为着凭借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5—16頁。

客觀的实际存在，从紛歧混亂的疑團中尋求真理，而不是以一種固定的願望來增加疑團的混亂。所以馬克思指示我們說：“批評從鎖鏈上摘去那裝飾它的臆想的花朵，並不是為的使人類繼續戴上這副失去任何幻想和任何樂趣的鐐銬，而是為的使人類掙脫鎖鏈並伸手去摘取活的花朵。”^①這，首先就要求我們在學術上從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社會學”的鎖鏈上摘去為資產階級學術招魂的臆想花朵，打破它主觀唯心論的鐐銬，從而使廣大讀者接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真理。因此，黨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策，使我們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指導下，展開學術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求取互相幫助，共同前進的協力。

因此，我們就必須首先考慮自己的缺點，並以正確的研​​究對待與自己不同的學術見解。這才能使學術思想的相互論爭，成為對自己，對歷史科學發展的更大的推動力。

在這將近兩年的病榻生活中，使我有充分時間來考慮自己過去的工作和來自各方面的批評。這些批評，除了個別的，如右派分子鄧春陽利用“百家爭鳴”整風，和我的病狀，先後在“教學與研究”及“人民日報”等刊物上對我進行的許多造謠毀謗的人身攻擊外，其餘一切都是善意的。當然，在這些善意的批評里边：一方面有些地方還可以商量，以後再慢慢商討；另一方面由於自己的水平很低，確實存在不少的毛病。特別是關於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些同志認為我的提法偏高，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其次，關於中國無產階級形成問題，我把工場手工業階段與大機器工業階段兩個不同階段的無產階級，用“近代”或“現代”來區分，就造成概念模糊的錯誤（詳見下文），

① “列寧全集”，第1卷，第215頁引。

其他毛病还不少。

这次刘大年同志在“历史研究”1958年1月号上发表的“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以下简称“关于序言”或“历史研究”）一文，提出我在“序言”及“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以下简称“初步研究”）一书中的若干问题，就进一步引起我对过去工作的极大注意，决心进行一次详细的检查。这种帮助，对我的教益是很大的，特别值得重视，当然，我并不是说他的文章都是正确的，因为还有许多地方值得商量。

其次，关于近百年史上中国社会从1840年以后逐渐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应该声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在任何文章中，只要提到这个问题，一直是肯定这一点的。所以，这个问题与我在“序言”中所建议的重新考虑近代史起点问题毫无关系。

因此，我感觉着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如果脱过去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特别是作为社会真正基础的经济情况是漆黑一团的话，现在已经明了的多了。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历史上的某些传统的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和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绝对看法，这一点，我在“初步研究”一书中曾作了粗略的研究，并在142页上就满洲族对中国的征服和统治在中国社会上所引起的停滞作用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里就延缓了二百年，自然，这里还不是终点，因为紧接着的还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它们又都是利用被侵略国家最落后的势力来进行统治和榨取的。因此，在政治上就延缓了腐朽封建势力的死亡，在经济上就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来排除和代替生产事业上的封建制……。因此，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和特殊性、或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论，从这里或者可以

找到說明的綫索吧。”

由此可見，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和“停滯”論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不是否認這個傳統的看法。至於這種討論還要影響到中國社會基礎一直到1840年以前還是“純粹自然經濟”，或者說是“完整的封建社會”，或“原封未動的封建社會”等說法，我認為：這種說法排除了當時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有商品經濟的發生和增長，在近年來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展開以後，顯然這樣提法是不全面的，因為資本主義關係的萌芽不會產生於純粹自然經濟基礎上，是一個常識問題^①。因此就不能否認當時中國社會內部商品經濟已有相當的發展，但也不排除當時中國小農經濟結構占主導地位。也不排斥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一文中所說：“中國社會底經濟結構，是由小農業和家庭工業配合而成的”的論斷。詳見下文。

問題在於這個小農經濟是在自然經濟之下呢？還是在商品經濟之下，抑或是自然經濟雖仍然占着優勢，但商品經濟已在有力地逐漸起來破壞着它，是必須具體弄清楚的。因為對這一社會經濟情形的判斷，不僅是說明當時農民分化的趨向問題的關鍵，也是說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於1840年的關鍵。我們知道：這個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較為現成的形式已經具備時發生的，這種形式還在公開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和成熟了。”^②斯大林的這句話是值得我們參考的。當然，中國的情形有所不同，但資產階級革命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經濟，只能從商品經濟中發展起來，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既然開始於1840年，說當時

①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第9—12頁。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026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116頁。

“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結合的自然經濟”的提法，就不够确切。这种情形，已为近年来关于資本主义萌芽的討論所补充，实际上，在封建社会内部，只有这种“新經濟”的“經濟組織”才能“改变着封建社会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扫除、摒棄和破坏旧社会所有一切桎梏”^①。搞清楚了这一点，过去我在“序言”中所說：近年来学术討論，將影响到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开始的起点問題，显然是不确切的，甚至有錯誤。因为就近代史的一般概念來說，是以資產階級革命作为起点的。因之，刘大年同志指出我的这个錯誤是对的。过去，我总是因4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不大，而鴉片战争又是外来的力量，因之，对于这个起点的年代有些怀疑，現在經過慎重考虑后，感觉着我的怀疑是不对的。造成这个怀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厚古薄今的傾向，对近代史沒有深入研究，所以就从形式上提出上述不够确切的怀疑。

至于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問題，我自己檢查，不仅从我主观努力上，或从我对中国历史問題的研究方法上，說我水平低認識不够而发生些毛病，当然是有的，且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象刘大年同志說我有什么“意图”“推翻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却是沒有的，这有大量事实的証明，并非空言。

因此，我想就刘大年同志在“关于序言”一文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分別談談我与他不同的看法，从而分析一下或作些解釋，从事实上来看我的“意图”是否如他所說的“早已徹底、干淨、全部推翻了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或者是我努

① 同上書，第117頁引“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5頁。

力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運用到研究中國歷史實際上，有時因理論水平低和能力不足而出現些毛病。這是必須弄清楚的。

二 “二者必居其一”和二者不居其一

這個題目，一看就知道是兩個對立的命辭湊成的。這兩個對立的命辭如果用之于兩個人對一個事物的看法，就必然有一個是正確的而另一個則是不正確，非彼即此，這是形式邏輯決定的。但是“非彼即此”的牢固界綫却是與辯證法的認識方法相違背的，因為他既承認“非彼即此”，也承認“亦彼亦此”。所以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除了在一定條件下，需要對抗性的階級區分範疇的東西以外，是否需要這種牢固界綫是值得商量的。因此，這裡要談的是在於我們對問題（或對事物）的看法：是根據具體事物的具體分析把事物的发展當作矛盾的統一起来看呢？還是根據表面的、片面和主觀的意願把发展當作“重複”和數的增加或減少來看呢？這裡也許兩人都爭着說：“我的看法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如是，只有從具體事實來檢查了。

問題的提出是我寫的“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中總結“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一文里边的一句話：“不拘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社會矛盾和鬥爭的內容與形式上，我們都可以看見明代，特別是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國封建社會已在開始起着本質的變化。”以及劉大年同志引我在同書上所說：“清初的商業資本與明代有所不同，即明末江南商業資本，曾因土地利微而不從事于土地的投資”^①。到清代，[因為它的統治階級是徹底代表腐朽封建大地主的利益的，並不斷縱容大地主抑制、剝削乃至劫奪工商業，因此，

① [] 內的話，因劉大年同志的刪削而改變原文的本義，特記出，下同。

商业資本……不但不能順利地破坏封建所有制，而且很少能轉化为产业資本，反而有頗大一部分轉向投資于土地。这对于巩固封建所有制是有一定作用的。从而一方面延緩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轉化，另方面就加重了对小农的排挤，也減弱了各种專門手工业发展的資力。] 但由于大量的农民被排挤出农村流向城市，而城市工商业由于統治階級的剝削、限制不能发展，无力容納，因之就再度形成以农民反对封建特权及大地产为主体的新的中国社会危机，即第二次中国封建社会大危机。”此外，刘大年同志还摘引同書119頁一段。

从这个总结的原話来看，其中是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具体内容的，并非“无的放矢”。所有这些論述的内容都包括在本書各节之中，如果从具体内容和这些話全面檢查起来，不但不排斥明末到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仍然是以小农經濟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詳見下文），更不排斥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由于外国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逐漸轉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事实。

但是我的主張因原文被刘大年同志“归納一下”就变成：

“一，明末三五十年間发生了由封建社会变为資本主义社会的本質变化。二，至清代前期，中国已是一个資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历史研究”第10頁“关于序言”）刘大年同志“归納”出这些話，与我根据具体材料分析所引出的結論，实无任何相关的地方。

这里，即使撇开本書中大量材料和时间、地点与具体分析不談，仅从表面上和邏輯上，也可看出刘大年同志的話与我的原話有本質的區別，如：我的原話“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質的变化”，就是說这个“本質的变化”在“开始起着”而不是这个变化已經完成或終結，或者达到“飞跃”的質变。为着防

止这种曲解，我在“序言”中曾特別指出：“也許有同志看見我們提出社会性質的問題来，会誤認為我們主張明代中国社会已是資本主义社会。不是的，我們肯定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内部，也有它发展不同的阶段。……明清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經是开始变化的封建社会。而社会的变化，从量变到質变还有很長一个过程，……自明代中叶以后，……已經是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社会，不再是自然經濟整体的‘完整封建社会’或‘原封未动的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經逐漸变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封建制度已經愈益成为要被推翻的东西了。”在序言中最后我还總結起来說：“总之，明清之际的封建社会性質在起着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是必須經過由量变到質变的緩慢的过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显然还未达到質变的程度，所以仍然是封建社会。”

这些，應該是够清楚了，不再加什么解釋也可以看出我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性質的看法了。但是刘大年同志却將我的研究和分析論断一笔抹煞，武断地說：这些都是“空話”及“其虛假沒有內容”。当然，在一篇短短的“序言”中只能作概括的叙述，因为作为內容的材料及对材料的具体分析都在書内几篇文章中。此外，在我写的“初步研究”一書关于明代資本主义萌芽的四节中，根据一定的具体材料，从各个方面来論證明代的社会性質，也得到同样的結論。如在明末“新的矛盾和新的斗争的萌芽”一节中，結語說：“此时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主要的矛盾还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但封建社会末期的农民与地主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也不同于中世紀。”

（同書61頁）这个不同，我接着就在63—64頁上指出：正統年間（1436—1449）的邓茂七的起义，以及万历年間无錫县志所載“佃田者不輸稅”，万历年間的泉州府志：佃戶預相訂約：